

ARTALKS:

藝術跨越疆界，產生溝通力量；談論引動思辯，傳達豐盛訊息

請輸入關鍵字搜尋



2026 年 8 月 13 日（星期四）



《我們正成為 WE Are Becoming》與機構批判（下）

Author: 吳宜樺

評論的展演: 《我們正成為 WE Are Becoming》

展演地點: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

展演時間: 2026.5.8 – 2026.8.16

刊登時間: 2026年08月10日 12時12分

最後修訂: 2026年08月13日 10時25分

Share Comments

在《我們正成為》展覽論述上最有力的隱喻出現了它必須面對的問題。「合唱」聽起來是多聲部的民主，但西方音樂史裡的合唱恰恰是高度紀律化的形式——它需要總譜，需要指揮，需要每個聲部在正確的時刻進入。當然，複音未必預設指揮：布農族的 pasibutbut 便是聲部之間相互聆聽、無總譜亦無指揮的自組織實踐。但正因為合唱不只有一種，問題才變得具體：這檔展覽實踐的是哪一種合唱？策展作為總譜書寫，與它所宣稱的複調生成之間，存在一個尚未言明的張力。這個張力有其制度性的底層。展覽將藝術從文化建設的附屬角色，重新定位為支撐社會想像與公共對話的「基礎設施」——這個主張與格雷伯、溫格羅把儀式、遊戲、季節性聚會視為政治自我意識之實驗場的論點高度親緣：人們在其中暫時搭建另一種社會秩序，再拆除它。展覽把冷戰基地轉化為可居、可臥、可遊的生成空間，本質上就是提供一個暫時性的、可逆的社會想像實驗場；「藝術作為基礎設施」在最好的意義上，就是把這種實驗場制度化為公共資源。但「基礎設施」的隱喻本身帶著國家建設的語法——何況 C-LAB 正是文化部轄下的機構——這與「becoming」的反建制脈動之間，是否存在策展論述尚未消化的矛盾？

必須說清楚的是：制度化本身並不是一種被卡住的自由。《萬事揭曉》從未提倡「無結構的社會」，或對公共性的官僚組織作全面性的否定——書中最有活力的社會，恰恰是懂得建立制度也懂得拆除制度的社會：因紐特人夏季服從威權的規範，冬季解散為平等的小群體；階序在那裡不是不存在，而是可拆卸的。人類許多有趣的創造力，正是在限制與規範之下被發明出來，也因此才有條件組織成集體社群——沒有規則的遊戲不成其為遊戲，沒有總譜的合唱也不成其為合唱。兩位人類學家要提醒的只是：其他可能性始終存在。卡住的標誌因此不是規範的出現，而是規範失去了可調節的空間——不可逆的制度設計只提供一種唯一可想像的選項。



圖說 | 劉秋兒〈缺牙鋼琴〉展場圖片 | 攝影：嘟嚕影像工作室 | C-LAB 提供

對於這檔展覽來說，問題於是變得具體：當「成為」被機構承接，藝術作品是否也為自己保留了成為別的東西的可能？合唱可以有指揮，但指揮的位置必須可見、可測繪、可輪替。又由誰來扮演？藝術的基礎設施，究竟由誰擁有、由誰演奏？展覽內部就有作品在進行這個提問。劉秋兒的《缺牙鋼琴》——那台以最低價格購入、曾是高雄豆皮文藝咖啡館核心物件的破爛鋼琴——在展場中開放觀眾重新彈奏，以最貧窮的物質方式和時間錯位且並置，和聲過去在社會邊緣位置的樂音。與之呼應，而更具有藝術家主體性銘寫特質的《新台北（佔領圖）：十年的距離》，是一組十件的系列畫作，深刻探討藝術家與機構之間的欲望與關係，以及雙方在藝術基礎設施中的不同座標生態系。藝術家累積十年的座標移動軌跡，於此格外關鍵。在這組作品中，抽象繪畫不再只是形式語言的探索，而成為介入機構、空間與歷史記憶的方法論：藝術家陳曉朋將藝術機構自身的基礎設施——機構標誌——轉化為創作的表層

形象與敘事命題，把特定藝術機構場域及其歷史脈絡加以視覺化與結構化。表面上，畫面以幾何抽象的造形語彙構成，看似冷靜、去情感化；實則承載高度政治性的提問。作品標題正是解讀的關鍵：「十年的距離」暗示對特定時間跨度下展出場域變遷的觀察與丈量；「佔領圖」則將幾何構圖與空間政治、權力部署相互扣連，使畫面成為對機構權力結構的測繪與詰問。該作突破西方藝術脈絡中的幾何抽象形式框架，變體成為承載機構批判的有力媒介——這些座標移動過，也還會再移動，藝術家征服藝術機構的版圖從來不是不可逆的。



圖說 | 陳曉朋〈新台北（佔領圖）：十年的距離〉展場圖片 | 攝影：啣嚙影像工作室 | C-LAB 提供

換言之，展覽並未逃逸「指揮」的問題，但它做了一件更誠實的事：把測繪指揮位置的作品，也編進了自己的合唱。這不只是容納批判的雅量——容納可以是姿態，可逆必須是結構——讓機構的座標、產權與時間性都攤開為可被丈量的對象。這正是上篇開頭懸置的「格局」判準之所在：格局不在方法論宣稱了什麼，而在於機構與展覽的反身性——制度條件是否為自身保留了在結構之間移動、被詰問、被重組的可能。以此衡量，《我們正成為》通過檢驗的方式頗為特殊——它不在論述層面回答指揮的問題，而是讓丈量指揮位置的作品進入展場，使答案成為可以被觀眾親自核對的事實。對抗「卡住」的方式，因此不是找回失落的起源，也不是拆毀一切制度，而是在制度內部保留讓藝術家重寫總譜的權利，證明我們從來具備成為別的東西的能動條件。格雷伯與溫格羅用數萬年的考古證據論證這件事，《我們正成為》用二十九件作品在一座冷戰遺址上排演它。論證只需成立一次，操演卻必須一再重來——這正是展覽以進行式自我命名的誠實之處：它把自身的完成式無限延遲，也因此把被詰問、被重組的權利，留給了下一次合唱。